

严译林译，功莫大焉

——写于商务印书馆创办 120 年之际

陈思和

1898 年，戊戌变法兴起旋而失败，有三个士人离开京城南下，他们告别了千百年来读书人孜孜追求的传统仕途，各自在实践中开拓新的人生道路。他们是清末状元张謇、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以及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他们三人，有的走实业道路，有的从事教育出版，敢为天下先，在风雨实践中，逐渐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新格局。

商务印书馆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重镇，与张元济的介入是分不开的。1902 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总理高位，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03 年，他隆重推出严复和林纾的翻译作品。“译才并世数严林”。20 世纪初两位最负盛名的翻译家的作品，都归入了商务旗下。从甲午到辛丑，晚清社会风雨飘摇。西潮澎湃，人们渴望放眼欧美，引入新知，以求改变国家的衰败境遇。于是翻译应运而起，引领了时代风气。严复的《天演论》初刻于 1898 年（沔阳卢氏慎始斋斋刻本），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初刻于 1899 年（自刻本，福州畏庐藏版）。两种译本都是译者的第一部翻译作品，皆一炮而红，洛阳纸贵。张元济就是看准了在这样时机下严译林译的价值。商务印书馆以整体性的包装、持续性的出版运作以及新式版税制度等等现代经营手段，牢牢吸引住了严复与林纾。出版社借重优秀作家迅速做大，著作家结缘出版社而名利双收，一时俊杰，风云际会，这是现代文化肇始之期的绝佳选择。

此举意义深远。关涉到中国现代出版、教育、文化等模型的建构，以及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奠定。严复原先也是士大夫阶级中的一员，亲历变法失败后，觉悟到“民智不可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于是自觉选择译介西方学术著作的工作，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继《天演论》后，他接连译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八部著作，全面介绍了西方进化论、唯物论、经验论，以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法学与政治理论，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开创了新纪元。

孔子是古代圣人，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他所编订的教材“六经”中，《诗》《乐》属文艺，《易》属哲学，《尚书》《春秋》属历史，《礼》属政治。以现代学科概念来看，“六经”完整体现了人文学科的基本内涵，两千年人文知识传统由此奠定。严复是借西方学术来重新建构人文知识传统，八部译著，关涉的是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逻辑学等等，隐含了中国古代人文传统中缺乏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范畴。社会科学的目的不在精神文明建构，而重在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获得社会科学知识的士人，便可在民间设定职业岗位，服务社会，影响国家。天下读书人由此开始摆脱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经济之途，形成独立于廊庙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群体。在这个意义上，把严复视为现代的圣人不为过。而这样一个“成圣”过程，正是商务印书馆来担纲完成的。众所周知，商

务印书馆依靠编辑新教材而发达，而商务出版严译系列，则是在更高层面的知识更新、教育更新和学科更新，奠定了重要基础，功莫大焉。

接下来我们讨论林译的意义。林纾不谙外文，依靠合作者的口译来翻译。如果从林译对原著是否忠实的角度来衡量，那就乏善可陈；但如果从译介传播的意义而言，无疑是成功的典范。林纾不仅是古文大家，而且对文学有特别敏锐的见解。如林译中有多部狄更斯的作品，林纾对狄更斯情有独钟，在多篇序跋中介绍狄更斯的创作艺术，从中摸索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特征。他介绍狄更斯：“迭更司，古之伤心人也。按其本传，盖出身贫贱，故能于下流社会之人品，刻画无复遗漏。”并比之于中国古文名家：“左、马、班、韩能写庄容而不能描蠢状，迭更司盖于此四子外，别开生面矣。”狄更斯的时代，文学已经开始从描写贵族阶级的生活转向了描写下层社会的人民，并以生活细节的真实刻画为主要创作特点。林纾对此及时加以总结，并指出是中国传统文学之外的新的艺术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西方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假如把不自觉的介绍也算在其中，林纾大概可称第一人。然而林译中的狄更斯小说，基本上都是商务印书馆印行的。

如果说，严复从社会科学领域给中国人打开了通向世界的视窗，那么林纾则在文学领域打开了通向世界的视窗。中国士大夫阶级一向以海内中心自居，

以为海外世界均是蛮戎狄夷。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妄自尊大的脾性稍打折扣，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声光电化不如西方，但仍坚持认为精神文明中国第一，意识形态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严复、林纾等人的翻译打破了痴人说梦，把那些只知道孔孟老庄、《诗经》《离骚》再加《红楼梦》的国学家们带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又百般奇异的新世界，让他们看到，外国除了有优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先进生产力以外，还有与他们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产品；外国不仅有中国一向缺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传统，也有中国一向引为骄傲的文学与哲学。这些译作唤醒了一大批迷醉于古国文明的读书人，为现代中国文化的诞生，做了最初的启蒙工作。

所以，商务印书馆在“双甲子”的节庆日前夕，决定重印《天演论》和《茶花女遗事》特藏纪念版，以纪念严译系列与林译系列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我认为是非常明智而且有典范性的举措。希望商务印书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面向世界、引进新知的立场，为现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世界视野下的人类精神财富的交流与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17 年 1 月 30 日，正月初三

（本文为商务印书馆重印《天演论》《茶花女遗事》序。题目为编辑所加）

东方欲晓

（国画）

许俊



海上书画名家唐云先生收藏的八把曼生壶，乃是紫砂艺苑中的名作，壶界收藏中的传奇。前不久，云老公子唐逸宽兄将八把曼生壶的全形拓赠我，以作清赏雅鉴。

这八把曼生壶的全形拓精到细腻、形神两畅——井栏、笠荫、合欢、石瓢提梁……云老长期供养这八把曼生壶，他的画斋也因此题作“八壶精舍”。茶人前贤东坡居士曾有“人生有味是清欢”“从来佳茗似佳人”的名句，对云老而言，在那个物质生活相当匮乏而神经又必须绷紧的年代中，这些茶壶大概就是他的“清欢”与“佳人”吧，丹青载道，茶壶养心，岁月菩提。

菩提，大致意思是觉悟智慧、超凡脱俗或是顿悟明觉。云老是颇有佛根性的，他的父亲因开怀大度就有“唐菩萨”之称。唐云学画之初也就崇尚曾出家过的恽南田，后来年轻的他 and 灵隐寺同样年轻的巨婴和尚成了好朋友，时常谈佛说禅，这个原上海光华大学的学生、日后成为一代佛学大师的巨婴称他是“半个出家人”。唐云为了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挟笔携履，行脚写生，净慈寺的若瓢和尚有时就跟着他行脚四方。他后来在《怀若瓢》诗中写道：“苦水祠边负手行，一秋十日住南屏。寺僧与我都飘泊，剩有湖山人梦青。”也正是若瓢和尚将唐云领进了风雨茅庐，使他与郁达夫成了知己好友。

唐云年轻时的尘世旅程与佛缘禅

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习惯。有些作家一挥而就，几乎不用修改，通篇读下来很完整，像我接触过的学者杨泓先生，从来都这样。我问他是不是成竹在胸？他说即便是急就章也是这样，可能是习惯吧。我认得的一个诗人也强调一气呵成，据说是保持写作中的原生态，这与中国的书法或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有点相像。更多的作家则相反，在不断反复的推敲、修改中完善文章。鲁迅有句名言：“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当然，写作状态因人而异，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作品好坏，取决于作品的质量，读者才不管他是“一日之迹”还是“十年磨一剑”。

传统媒体时代，作家写成作品交给媒体，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才能付诸发表，中间要经历审稿、修改、定稿、校对等等环节。编辑按照自己报刊的宗旨改稿也是重要的一环。有些作者对编辑改稿无所谓，有些则非常反感，甚至觉得多此一举。客观地讲，编辑的有些修改加工，并非多余，有些的确对原稿的质量有提升，当然有违原作者之意的也屡见不鲜。前者如《高玉宝》《林海雪原》《徐悲鸿的一生》等书，据说编辑花了大功夫。至于改坏的，笔者举个自己做编辑时碰到的例子。

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文物》杂志做编辑，领导对名人稿是有要求的。像我们这样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最初都有围“名老头”的经历，比如去围启功，启先生有次有点不耐烦，说：“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不要老找年纪大的，哪有精力，你们要发现一些新作者。”话虽那么说，找名老头是条捷径，见效快，发稿率高。比如我好几次向故宫的朱家潘先生约稿，每次他都表示写出来就给我。那时，朱先生年近八十，他所在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局还有其他机构，以各种名义派他约他的话很多，他还经常应邀去参加各类活动，根本没时间写稿子。但朱先生近八十，他所在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局还有其他机构，以各种名义派他约他的话很多，他还经常应邀去参加各类活动，根本没时间写稿子。但朱先生近八十，他所在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局还有其他机构，以各种名义派他约他的话很多，他还经常应邀去参加各类活动，根本没时间写稿子。

有些名人不在乎删改，信任编辑的职业眼光。传闻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海粟经常在报刊发文章，那时发文章不太容易，大至历史事件、人物评价，小至措词用语，把关极严。海老了解个中情势，常常主动跟编辑打招呼“只要能发表，删改没关系”，显得非常宽容。

老诗人忆明珠非常不喜欢别人动他的文字，说被改过后文气大伤，不忍卒读。诗人写过一则随笔，记录他短诗发表时的不幸遭遇。“昔年余画猫，题曰：彼猫不露肢与手，花荫独坐拥黑裘；杀机全在眸子里，俨然名士自风流。此诗后经友人投给一家地方刊物，编辑某公曰：‘猫有手乎？猫有脚乎？’即提笔改曰‘彼猫不露肢与爪’云云，并以其改稿刊出之。余见刊后，但有徒唤奈何而已。”当然，像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这样的情况，想是极少数。

孙机先生是现在读书界一本非常走俏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作者，他也反对编辑改他的稿子。我手头就保存了一封他附在稿子后面的短信，声明“如不合用，弃之可也，不必客气。唯敬希免赐修改”。话说得毫不含糊，直截了当拒绝编辑修改。当然，孙先生这样讲，也有他的底气，他是目前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者。

电脑代替笔墨进入日常生活，被人称为“换笔”，这样的技术革命也引出许多趣事。这是新旧交替阶段难以避免的问题。我编过的《收藏家》杂志，当时经常要请一些八九十岁的老先生写稿，他们的稿子还习惯于手写，对于收藏圈而言，未尝不是一桩幸事，至少还有手稿传下来，不过对于编辑来说，就是苦差事了，处理稿件的工作量也要多承担。黄裳先生生前，我约他写谈古书的专栏，整整一年半，读者爱读，文章水平也高，但编辑的工作量真不小。最大的问题是黄先生每次提供的复印件质量欠佳，辨认不易，还有不少异体字。杂志上因大量来稿为电子文本，删减录人员，手写稿没人处理，只好临时请同事帮忙或打印社录入，虽经核对，错误仍不在少数。每次与黄裳先生通信，他寄回的校样都附一张便笺，谈及校对，总是满腹牢骚，至今还记得他那封不顾情面的短信：“校样悉，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错得那么多，不校正不行。”黄先生所处的时代，人工是不惜的，只求准确性高。轮到我们这个时代，改革不断，最后不外乎讲求效率。黄先生不察，以为一块大牌子底下的杂志，人力一定是充足的，哪知道“今是昨非”，“巧妇”夹在中间十分为难。

这种情况今后大概不会再发生，因为以手写为笔耕方式的那辈老先生不大会有了。我们只是这个转型时代遭遇换笔变局而身处尴尬冲突的少数人。从大历史的眼光看，这类文人细事不值一提，但有些有趣的往事竟也令人难以忘怀。

2017 年 2 月 19 日蓝旗营小区

钱锺书致周采泉手札小考

彭伟

版校勘未精，论漏无虑三四百处，俟他日重刊，当呈教耳。亡友陈君式圭出先公之门，与弟非同学，四十年前归国曾一面，遂成永别。沧海扬尘，圭面化冢，访旧多登鬼录，所谓“此身虽在堪惊”也。专复，即颂暑安

钱锺书上
八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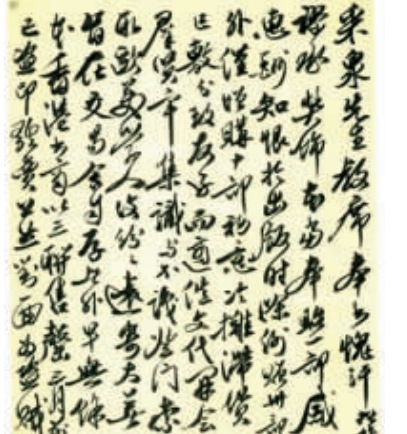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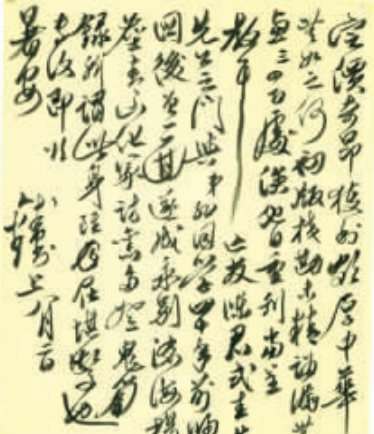
粗略观之，这通书札应当写于“文革”之后。若求其翔实，当就线索一一考察。

钱氏信末提及四十年前有过一面之缘的“先公”（钱基博）门人陈式圭，这个名字倒不陌生。“徐（燕谋）郭（晴湖）擅词翰，陈髯（式圭）亦秩群”，见于钱氏《槐聚诗存》一九三九年《杂书》诗一组，是“相望不得亲”的“好我二三子”，可见彼此见面甚少。信中又提到其时“适值文代开会”，“文革”结束后十余年间，中国文联先后召开了两次文代会，一次在 1979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16 日，一次在 1988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此札应当写于 1979 年后。

1979 年文代会前夕，钱锺书先生确有大著出版，且为两部，一为《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为《管锥编》（中华书局）。从“中华无如之何”来看，信中所言正是后者。“文革”万木凋零，1979 年才刚刚回春，《管锥编》就硕果已成，在当时学界引发的震动，已见于多方记述。同去参加文代会的学者郑朝宗，就在宾馆里收到了钱先生所赠的全套四册；而钱先生于同年冬天，赠第一册给了另一位学者傅璇琮。至于“欧美学人”，则未必全是“交易”，也不乏主动奉赠之例。1979 年 4 月 13 日，钱锺书先生访美前夕，去信夏志清：“《管锥编》约百万言，国庆前可问世……届时将一奉呈海正。”对余英时，更是两次航邮寄赠四册，且每册都亲笔批校（《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从销售上来看，大约也如信札所言。据笔者所知，钱锺书、杨绛的多年挚友朱雯、罗洪两位，并没去索要，而是自行购买。如此一来，《管锥编》欲求“冷摊滞货”亦不可得了。见微知著，火热可想。大约正是因为畅销，香港书商才会将盗版目光盯到了这样一部艰深的学术巨著之上。钱锺书先生不无愤慨，不下于后来的《《围城》汇校本》一案。

钱、周二公闲话旧雨，惊于沧海扬尘四十十年。如今后生小子有幸拜观前辈手翰，又近四十年光阴之后了。



岁月菩提

王琪森

喝得神采飞扬，特别是嘬一口酒后双眼眯成一线的那种满足感，醉眼迷离中，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感。但据逸览讲，老爷子当时正处在批“黑画”的风口浪尖上，被说成是“复辟回潮”的总代表。批斗他这个国画界“新老头子”时，他低头站在台上，看脚下的地板纹如云山缥缈的山水画，竟连冲天的口号声也听不见了，真是“如坐三昧，菩萨不知”，他是做到了“让思想冲破牢笼”的。

云老曾说过：“做人本来就是苦的，所以生下来是哭而不是笑。”他以旷达胸襟来应对这种宿命的轮回与抗衡红尘的无奈。山水画家苏春生教授曾对我说：“文革”时，他知道云老在画院中被批挨打，不放心，去云老家看望。当他走近云老家门口时，只见云老穿着一件老头圆领衫，在大汗淋漓地拍苍蝇。一问才知道，街道里规定，“牛鬼蛇神”每天要交一小瓶苍蝇。云老挺自信地讲：“我的眼力还可以，你看看，已拍了不少了。”见此状态，苏春生放心了。后来我也听



云老讲过：“造反派说：你们牛鬼蛇神也是‘四害’，把你们打倒不消灭，是党的宽大政策，自然界的‘四害’，你们是要去消灭的——我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噢。”——世道再艰难凶险，为人做事还是要淡然静定。

云老有一方有“长乐未央”四字的汉瓦当观，当时并不值钱。云老反复把玩，并题了砚铭：“得寸田，斯力食，长守缺，乐无极。”从而增加了此物的文博含量与收藏价值，这也是一个收藏大家对器物的贡献。紫砂名家许四海先生做了一把“掇球壶”，请云老题壶铭，他即兴写道：“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碗各自东西。”书画大家白蕉归山后，唐云面对好友留下的不少撒了一半的兰花，画了三二枝的修竹，拿回家一一补完并题款，以诗记之：“白蕉罢画掇球去，老药碾成换酒来。一酌入天心未了，东风流水绕花开。”如今，这样的大家已很难寻觅了，或许就是因为云老这样的岁月菩提之心很稀缺了吧。